



Siegfried Lenz

德语课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许昌菊 译

e u t s c h s t u n d e

南海出版公司

013029414

1516.45
184-2

德语课

D e u t s c h s t u n d e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许昌菊 译



L
O
N
D
O
N

S
I
E
B
E
R
I
E
S

I 516.45

184-2

南海出版公司



北航

C16383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德语课 / [德] 伦茨著; 许昌菊译. — 2 版.
—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3
ISBN 978-7-5442-6437-2

I. ①德… II. ①伦…②许… III. ①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8652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08-294

DEUTSCHSTUNDE by Siegfried Lenz
Copyright © 1968 by Hoffmann und Campe Verlag, Hamburg, Germany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GmbH, Germ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德语课

[德] 西格弗里德·伦茨 著
许昌菊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 (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灿灿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400 千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3 月第 2 版
2013 年 3 月第 5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437-2
定 价 39.50 元

版权所有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北航

C1638300

西·伦茨的《德语课》

余华

一九九八年夏天的时候，我与阿尔巴尼亚作家卡塔雷尔在意大利的都灵相遇，我们坐在都灵的剧场餐厅里通过翻译聊着，不通过翻译吃着喝着。这时的卡塔雷尔已经侨居法国，应该是阿尔巴尼亚裔法国作家了。九十年代初，作家出版社出版过他的一部小说《亡军的将领》，我碰巧读过这部小说。他可能是阿尔巴尼亚当今最重要的作家，像其他流亡西方的东欧作家那样，他曾经不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我们见面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只要他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回去了。不过他告诉我，他回去的次数并不多。原因是他每次回到阿尔巴尼亚都觉得很累，他说只要他一回去，他在地拉那的家就会像个酒吧一样热闹，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会去访问他，最少的时候也会有二十多人。

因为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曾经有过“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友谊，我与卡塔雷尔聊天时都显得很兴奋，我提到了霍查和谢胡，他提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这四位当年的国家领导人的名字在我们

的发音里频繁出现。卡塔雷尔在文革时访问过中国，他在说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时，是极其准确的中文发音。我们就像是两个追星族在议论四个摇滚巨星的名字一样兴高采烈。当时一位意大利的文学批评家总想插进来和我们一起聊天，可是他没有我们的经历，他就进入不了我们的谈话。

后来我们谈到了文学，我们说到了德国作家西格弗里德·伦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说起的，可能是我们共同喜爱伦茨的小说《德语课》。这部可以被解释为反法西斯的小说，也就可以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版。

卡塔雷尔说了一个他的《德语课》的故事。前面提到的《亡军的将领》，这是卡塔雷尔的重要作品。他告诉我，他在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无法在阿尔巴尼亚出版，他想让这本书偷渡到西方去出版。他的方法十分美妙，就是将书藏在书里偷渡出去。他委托朋友在印刷厂首先排版印刷出来，发行量当然只有一册，然后他将《德语课》的封面小心撕下来，再粘贴上去，成为《亡军的将领》的封面。就这样德国人伦茨帮助了阿尔巴尼亚人卡塔雷尔，这部挂羊头卖狗肉的书顺利地混过了海关的检查，去了法国和其他更多的国家，后来也来到了中国。

我说了一个我的《德语课》的故事。我第一次读到伦茨的小说是《面包与运动》，第二次就是这部《德语课》。那时候我在鲁迅文学院，我记得当时这部书震撼了我，在一个孩子天真的叙述里，我的阅读却在经历着惊心动魄。这是一本读过以后不愿意失去它的小说，我一直没有将它归还给学校图书馆。这书是八十年代翻译成中文出版的，当时的出版业还处于计划经济时代，绝大多数的书都是只有一版，买到就买到了，买不到就永远没有了。我知道如果我将《德语课》

归还的话，我可能会永远失去它。我一直将它留在身边，直到毕业时必须将所借图书归还，否则就按书价的三倍罚款。我当然选择了罚款，我说书丢了。我将它带回了浙江，后来我定居北京时，又把它带回到了北京。

然后在一九九八年，一个中国人和一个阿尔巴尼亚人，在一个名叫意大利的国家里，各自讲述了和一个德国人有关的故事。这时候我觉得文学真是无限美好，它在通过阅读被人们所铭记的时候，也在通过其他更多的方式被人们所铭记。

目 录

西·伦茨的《德语课》(余华) / I

惩罚 / 1

禁止绘画 / 14

海鸥 / 32

生日 / 55

躲藏 / 81

第二视觉 / 110

中断 / 137

肖像 / 161

回家 / 186

半小时的期限 / 209

看不见的图画 / 231

聚光镜下 / 255

生物课 / 283

观察 / 314

重操旧业 / 339

恐惧 / 363

病态 / 383

参观 / 405

海岛 / 428

分别 / 444

惩罚

他们罚我写一篇作文。约斯维希亲自把我带进我的禁闭室。他敲了敲窗前的栅栏，按了按草垫，然后，这位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又仔细检查了我的铁柜和镜子后边我经常藏东西的地方。接着，他默默地而且生气地看了看桌子和那满是刀痕的凳子，还把水池子细瞧了一遍，甚至用手使劲地敲了几下窗台，看它有无问题。他随随便便地检查了一下炉子，接着走到我面前，慢腾腾地将我从肩膀到膝盖搜查了一遍，确信我的衣袋里没有什么有害的东西。然后，他带着责备的神情把一个练习本放在我的桌上，这是一个作文本，灰色的签条上写着：西吉·耶普森的德语作文本。他招呼也不打一声就向门外走去，他失望，感到自己的好意受到了伤害；因为这位受我们喜爱的管理员约斯维希对我们不时受到的惩罚比我们更敏感，他痛苦的时间更长，所受的影响更大。他不是通过语言，而是通过锁门的动作，向我表示了他的伤心失望。他把钥匙伸进锁眼时显得毫无生气，捅了又捅，像是不知所措的样子。第一次转动钥匙前他踌躇了一下，接着转动起来，把锁弹开，随后像是对这种犹豫不决的回答，

责备自己似的粗暴地转动了两下钥匙。不是别人，恰恰是卡尔·约斯维希，这个文弱、羞怯的人为了罚我做作文而把我关了起来。

尽管我几乎坐了一整天，但怎么也开不了头。眼望窗外，易北河在我眼前模糊地流过；我闭上双眼，它仍在不停地流；河上铺满了闪着蓝光的浮冰。我不得不目随那条拖船，它用漆皮已经剥落、加挡板的船头把灰色的冰块剪裁成各种样式；我不得不注视那河流，看它如何洋溢着把冰块冲向我们的海滩，向上挤，哗啦哗啦地向上推，一直推到干枯的芦根丛中，并把它们遗弃在那里。我厌恶地看着一群乌鸦，它们似乎在施塔德有约会一般，一只一只地从韦德尔、从芬肯韦尔德和汉内弗尔山特飞来这里，在我们岛上聚集成群，随后飞上天去，在空中盘旋，直到一阵顺风吹来，把它们送往施塔德。多节的柳树，裹着一层闪亮的薄冰，还蒙上一层干白霜，也使我分心；白色的铁丝网、车间、海滩边的警告牌、菜地里冻硬的土块——春天，我们在管理员监督下，自己在这里种菜——所有这一切，甚至太阳，那隔着乳白色窗玻璃而变得灰蒙蒙、投下许多长长的斜影的太阳，都分散我的注意力。有一回，我几乎就要动笔了，目光却又不自主地落到用铁链系着的、满是伤痕的浮桥上，桥边系着一条从汉堡来的汽艇，船身不长但舱房宽大、黄铜锃亮。这条船每个星期要运送多达一千二百名心理学家到这里来，这些人对难以教育的青少年怀着病态般的兴趣。我不能不注视这些心理学家沿着海滩上弯曲的小路走上来，然后被领进蓝色的教养所大楼。在一般性的问候之后，人们还可能提醒他们要小心谨慎，进行调查时要不露声色。随后心理学家们迫不及待地拥出楼外，装出一副毫无目的的样子，但对我们这个小岛却事事感兴趣，并去接近我的朋友，例如佩勒·卡斯特纳、艾迪·西鲁斯和脾气暴躁的小库尔特·尼克尔。

这些人之所以对我们如此感兴趣，也许是教养所曾经断言，在这个小岛上经过改造的青少年，离开这里以后，百分之八十可能不再犯罪。如果不是约斯维希因为罚我写一篇作文而把我关在这里，心理学家们也可能追在我身后，把我的经历放在他们的科学聚光镜之下，力求获得我的形象。但是，我必须加倍地补上德语课，必须交出作文来，瘦长而可怕的科尔布勇博士和希姆佩尔所长等着要。邻近的汉内弗尔山特岛也位于易北河下游，在特威伦弗莱特和维施哈芬方向，那里同我们这里一样，也关着一些难以教育、有待改造的青少年。尽管两个岛的情况一样，尽管它们同样都被油污的海水包围着，同是那些船只驶经这里，同是那些海鸥在岛上栖息，但在汉内弗尔山特岛上却没有科尔布勇博士，没有德语课，没有作文题，没有这种（说句老实话）大多数人甚至还要因此受肉体折磨的作文题。所以，我们许多人宁愿在汉内弗尔山特接受改造。海船首先从那里经过，在那里，炼油厂上空的熊熊火焰不断地向每一个人致敬问候。

我要是在邻岛上，肯定不会受罚写作文，因为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在那里是不会发生的。瘦长的、满身散发出药膏味的科尔布勇走进教室，轻蔑而又吓人地端详着我们，等我们说了“早上好，博士先生”，他便一声不吭、不动声色地分发作文本，单是这些就够人受的。他什么也不说。我看他就像享受一种乐趣似的走近黑板，拿起粉笔，抬起他那难看的手，袖子滑到了胳膊肘，露出一条干瘪、蜡黄、至少是百岁老人的胳膊。他用弯弯曲曲、歪歪斜斜的字体，一种做作的歪斜字体把作文题“尽职的快乐”写在黑板上。我惊恐地向班里看去，看到的只是弯曲的脊背、困惑的面孔；大家交头接耳，脚在地上蹭来蹭去，个个都在唉声叹气。我的邻座奥勒·普勒茨张开他那肥厚的嘴唇，低声地跟大家一起念，他的抽疯病快犯了。沙

利耶·弗里德伦德尔本事最大，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使自己的脸色变白变绿，可以随时装出有病的样子，致使所有的教育员都自发地免除他的一切作业。沙利耶已经耍起他的呼吸把戏来了，尽管脸色还未变，脖子上的青筋已经在搏动，额头和上唇已经满是汗珠。我拿出一面小镜子，斜对着窗户，把太阳光反射到黑板上，吓得科尔布勇博士回转身来，两大步迈到讲台边，定了定神，要求我们立即开始写作文。他再一次举起了干瘪的胳膊，用食指僵硬地指着作文题“尽职的快乐”，为了避免大家提问，便补充说：每个人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必须是同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有关。

对我的惩罚——将我禁闭起来写作文和暂停会客——是不公平的。他们让我悔过，并非由于我的回忆或想象不成功；他们关我的禁闭，是由于我顺从地搜索枯肠，看有没有尽责任时的快乐可写，并且一下子有那么多话涌上心头，多得我费尽力气也找不出一个头绪来。既然不是爱写什么就写什么，既然规定要写尽职的快乐，而这正是科尔布勇企望我们发现、描述、探究，以及无论如何要明确证明的，所以，浮现在我眼前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我的父亲严斯·奥勒·耶普森，他的制服、公务用的自行车、望远镜、风雨衣和他在刮个不停的西风骑车行驶在大坝高处时的侧影。在科尔布勇博士催促的目光下，我立即想起，春天，不，是秋天，哦，是在某个夏日，天阴，凉风习习，父亲和平时一样，推着自行车走在狭窄的砖路上。跟平时一样，他在鲁格布尔警察哨的牌子前停下，抬起后轮，把脚蹬移到起蹬的高度，习惯地用脚蹬了两下才骑上座子，先是晃晃悠悠，接着又颠了几下，衣服被西风吹得鼓鼓的，朝通往海德和汉堡的胡苏姆公路骑了一段，在泥煤塘边上拐弯。这时，风从侧面吹来，他顺着鼠灰色的水沟向大坝骑去，经过已经掉了叶片的风磨，在木

板桥后边下车，推着车走上高耸的大坝的斜坡，到达顶上。在空旷的地平线前，他显得意想不到的高大。随后他又晃晃悠悠地骑上车，像一条孤独的帆船，披着被风吹得膨起、几乎要爆炸的风雨衣，从大坝顶上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而且总是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他从来不忘自己的任务。当秋风把浮云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吹到这边的天空来时，我的父亲正在公务途中。无论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春天，还是在雨中，无论在阴沉沉的星期日，还是在清晨或傍晚，无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在平时，他总是在自行车上颠簸，向着自己使命的死胡同里蹬去，这条死胡同永远只引他到一个地点——布累肯瓦尔夫，阿门。

这一情景，德国最北部的警察哨——鲁格布尔农村区警察局外勤哨必须一天不停地辛辛苦苦骑自行车执勤的情景，我一下子就回忆起来了。为了替科尔布勇效劳，我还进而想起，那时，我常常系着一条围巾，坐在公用自行车的后架子上，跟着父亲一起向布累肯瓦尔夫驶去。我总是用湿冷的手指牢牢抓住父亲的皮带，车架硬邦邦的钢条在我的大腿上留下了一道道红印。我看见自己坐在车后，我们两人迎着傍晚的浮云，行驶在大坝上；我感觉到从荒芜的沙滩上毫无阻拦地刮来的阵阵劲风，我们两人就在这阵阵劲风中从远方颠簸而来；我听到父亲因使劲蹬车而气喘吁吁，这不是由于风大而失望或者发怒，只是按着蹬车的节奏而喘息，我觉得，这喘息声中还带着暗中扬扬自得的味道。我们沿着海滩，沿着冬天黑色的大海向布累肯瓦尔夫行驶，除了倒塌的磨坊和我的家以外，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为我熟悉的了。这栋房子坐落在肮脏的房基上，两侧杨树成行，树冠修成尖削状并弯向东方。我在摇摇晃晃的木头门前下了车，打开门，侦察的目光扫过住房、厩舍、棚子和画室，马克斯·路

德维希·南森常常从这间画室向我狡黠地、存心威胁似的眨着眼睛。

南森被禁止绘画。我的父亲，鲁格布尔警察哨的警察，一年四季不论什么天气都必须来这里检查禁令的执行情况。一旦发现南森有创作的念头就要加以制止，更不用说动手画画了；总之，警察局必须密切注视不再让住在布累肯瓦尔夫的这个人绘画。我的父亲和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早已相识，我是说，他们从小就相识了，由于都是格吕泽鲁普人，他们之间不用语言就能相互了解，或许还能够了解彼此的处境，以及如果这种境况延长下去的话，这一个将给另一个带来什么结果。

至少，父亲和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的会面还完好地保存在我记忆的保险箱中，因此，我自信地打开了练习本，把小镜子放到一边，试图描写我父亲骑车到布累肯瓦尔夫去的过程。不，不只是描写他骑车前往的过程，而且也描写他为南森设下的圈套，那些逐渐引起南森猜疑的简单和复杂的诡计，各种花招和迷魂阵，按照科尔布勇博士的意思，我还得描写他在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我做不到。我没写成。我一再从头回想起，我如何目送父亲向大坝走去，他有时披着风雨衣，有时没披，在有风或无风的日子，在星期三或星期六，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心中太不平静，太波动，太杂乱无章；父亲还没有到达布累肯瓦尔夫，就在我眼前消失了，代替他的是一群纷飞的海鸥，一条满载的挖泥煤的旧船在风浪中摇晃，或者一个降落伞在浅滩上空飘动。

展现在我眼前的主要是那堆很旺的小火苗，它烧毁了我回忆起来的一切情景和事件，将它们烧化，化为烈焰。如果火舌卷不着它们，不能把它们烧化，使它们变作焦炭的话，那么，抖动的火苗也会把它们遮掩住。

于是，我尝试另开一个头，想象自己来到了布累肯瓦尔夫，马克斯·路德维希·南森狡黠地眨着他的灰色眼睛，帮助我整理记忆：他把我的目光引到他身上，讨好我似的从画室里走出来，穿过花园向他经常描摹的百日草走去，慢腾腾地走上大坝。天空一道沉郁而刺目的黄色，偶尔被阴暗的蓝色划破，南森拿起望远镜，向鲁格布尔方向望了一眼，拔腿就跑回家去，藏进屋里。我差不多已经找到一个头绪了，这时，窗户被人推开，南森的妻子迪特跟平时一样，递过一块点心来。许许多多往事，一下子呈现在我眼前：我听见布累肯瓦尔夫学校的一个班级在唱歌；又看见一个小小的火苗；听见父亲夜间动身的声音。外乡孩子约塔和约普斯特钻在芦苇丛中吓唬我。有人把画家的颜料扔进水坑里，水坑像鲜艳的橙子似的闪闪发光。一位部长在布累肯瓦尔夫发表演说。父亲向他致敬。挂着外国汽车牌号的大型轿车停在布累肯瓦尔夫。父亲向它们致敬。我躺卧在倒塌的磨坊中，在南森的作品隐藏的地方，梦见父亲用绳子拴着一团火，松开颈圈，并且命令这团火说：“搜！”

这一切，交织在一起，盘根错节，愈益混乱，直到科尔布勇警告的目光突然向我扫来。这时，我竭尽全力整理我那纵横交错的记忆，摆脱了那些次要情节的纠缠，使一切都毫不隐藏、易于描绘地显现在眼前，特别是我的父亲和他履行职责时的快乐。我也做到了这一点，把所有关键性的人物都集合在大坝下，排成了检阅的队列，正要让他们一个个走过我面前时，我的邻座奥勒·普勒茨大叫一声，在效果非凡的痉挛中从凳子上倒下。这一声剪断了我的全部回忆，我也开不了头，只好放弃动笔的打算，所以，当科尔布勇博士收作文本时，我交上去的是个空本子。

尤利乌斯·科尔布勇理解不了我的难处，不相信我开不了头的

苦衷。他简直不能想象，我记忆的铁锚竟然没有能固定的地方，铁链绷得那样紧，却只是虚张声势地发出一阵阵铿锵声，至多从深深的河底掘起一团团污泥，因此得不到为张网捕捞往事所必需的平稳和静止。

这位德语老师惊讶地翻了我的作文本后，叫我站起来，一面稍带厌恶，一面确实疑惑不解地注视着我，要求我作出解释，而他又不能对我的解释感到满意。他怀疑我真有回忆往事和发挥想象力的善良愿望，否认我文章开不了头的苦衷，只是说：你的样子看起来不是那么回事，西吉·耶普森。并且反复强调说，我交白卷是同他作对。他不信任我，硬说我是反抗、心怀敌意等等。由于这类问题归教养所所长负责处理，科尔布勇上完德语课便把我带进了蓝色的管理所大楼一楼楼梯旁所长办公室。这堂德语课留给我的，只是因为自己的回忆杂乱无章、捉摸不定、怎么也串连不起来而感到的痛苦。

希姆佩尔所长老是穿着一件短风衣、一条过膝裤。他正被大约三十二个心理学家包围着，这些人对青少年刑事犯罪问题表现出狂热的兴趣。所长的桌子上放着一把蓝色的咖啡壶，几张不干净的五线谱纸，其中几页有他仓促创作的描写景色的简单歌曲，歌唱易北河，湿润的海风，海滩上柔中有刚的杂草，翱翔的银色海鸥，飘动的头巾，以及浓雾中的航船紧急的汽笛声。我们的海岛合唱队命中注定是所有这些歌曲的第一个演唱者。

我们走进办公室以后，心理学家们沉默地倾听科尔布勇博士向所长所作的汇报。报告的声音虽然很轻，但我仍能听到他又在重复反抗或心怀敌意这类话，为了证明这一点，科尔布勇把我的空白作文本交给了所长。所长和心理学家们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目光，然后朝我走来，他卷起我的作文本，打了一下自己的手腕，又敲了一下

自己的过膝裤，要我作出解释。我看着这些紧张的面孔，听见身后还有轻轻的咯咯响声，原来是科尔布勇正在拉自己的手指，见到一群人围着我等待解释，我真感到受罪。墙角有一个大窗户，窗前摆着一架钢琴。我望着窗外的易北河，看见两只乌鸦在飞行中争食一段软软的东西，也许是一截肠子，咽下去又吐出来，直到这段东西落在在一块浮冰上，被一只警觉的海鸥叼走为止。这时，所长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几乎是友好地向我点了点头，再一次要求我，当着全体心理学家的面作出解释。于是，我向他叙述了自己的困境：我如何想起了和作文题有关的重要情节，后来思绪又如何乱成一团；我如何寻找落脚点，想要由此深入回忆，但没有找到。我向他讲了许多人物的面孔，因为挤在一堆，分辨不清，还有各种活动穿插在我的记忆中，这一切使我怎么也开不了头，怎么尝试都归于失败。我也没有忘记告诉他，尽职的快乐在我父亲身上是一贯的，因此，为了如实反映，我只好不加剪裁地描写，无论如何也不能随意选择。

所长惊讶地，甚至也许非常理解地倾听着我的叙述。而心理学家们一边低声议论，一边进一步靠近我，他们相互碰碰胳膊，讲了一些心理学术语：“瓦滕堡式的知觉缺陷”，“视错觉”，特别使我反感的是，他们甚至用了“认知障碍”之类的字眼。我已经做了该做的一切，怎么也不愿再在这些一定要把我研究透的人面前说什么了——岛上的生活早已使我得到了足够的教训。

所长沉思着把手从我肩上挪开，端详着它，也许想要鉴定这只手是否还完整。他转身在来访者无情的注视下向窗户走去，望着窗外汉堡的冬天，似乎想从它那里获得什么启示和建议。突然，他向我转过身来，眼皮也不抬地宣布了他的决定。他说，应该把我带进我的单身禁闭室去，“体面地隔离起来”，不是为了悔过，而是为了